

13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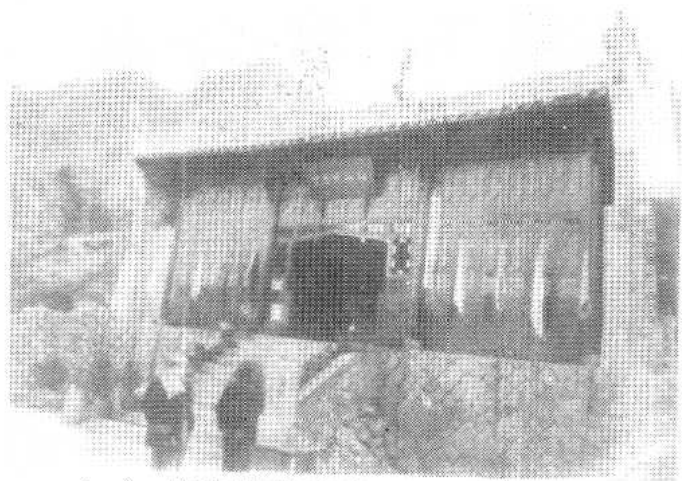
霞浦文史资料

第九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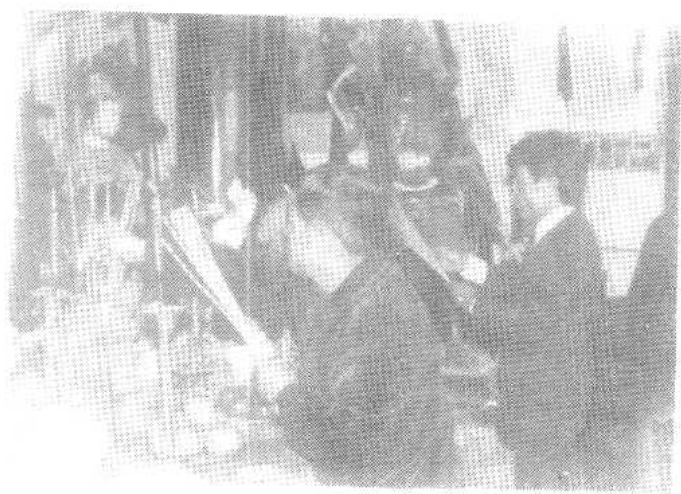
75510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霞浦县委员会
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松山靖海宫



(一) 宋代建于洄澜岸口的松山妈祖行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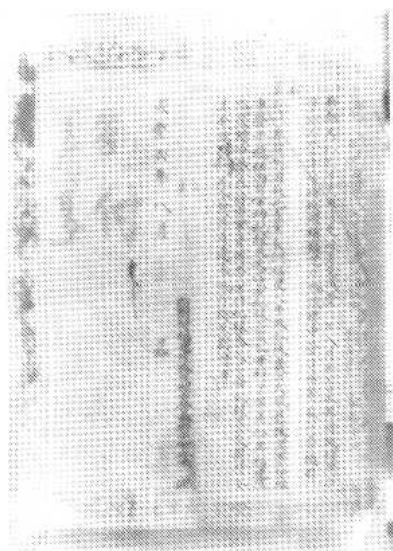
(二) 三沙开埠后接待站台胞经常到此
烧香朝拜

(三)

三月廿三日妈祖诞辰民间庆典活动



清咸丰六年兵部密付董长洲中营守备



七佛城中玉山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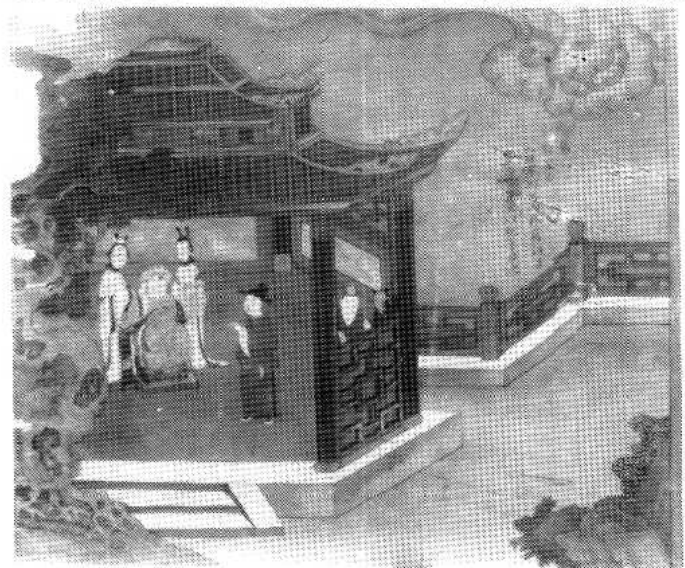
(一) 七佛城上杜鹃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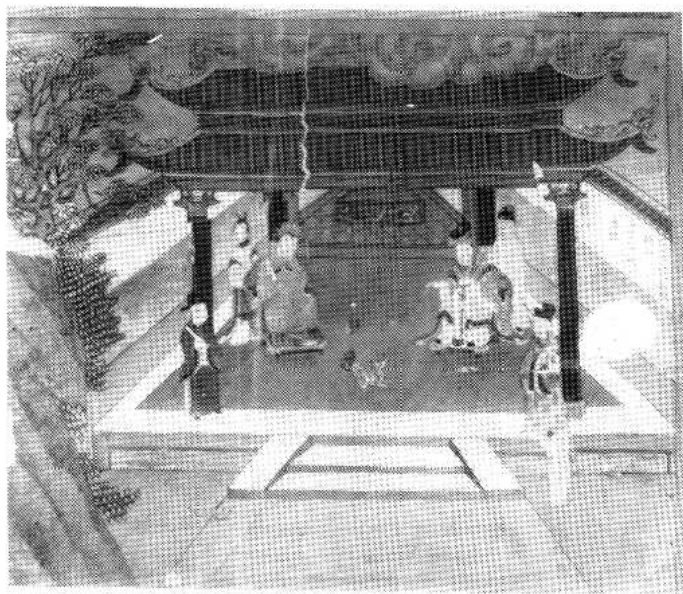
(二) 玉山寺旁摩崖石刻之一

畬族三宝之一 祖 图

该祖图共四幅三十图，清嘉庆十四年绘制至今尚保存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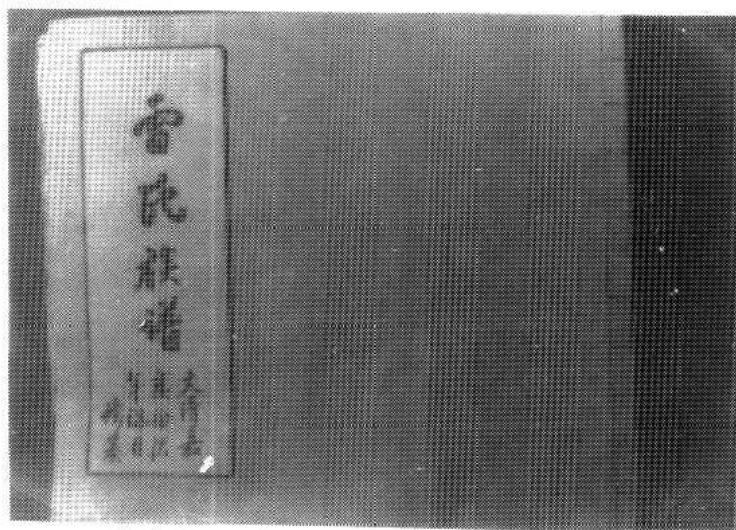


此图系第六图，文曰：「刘皇后二日，不期耳内疼痛，诏召医治，取出一虫，以匏叶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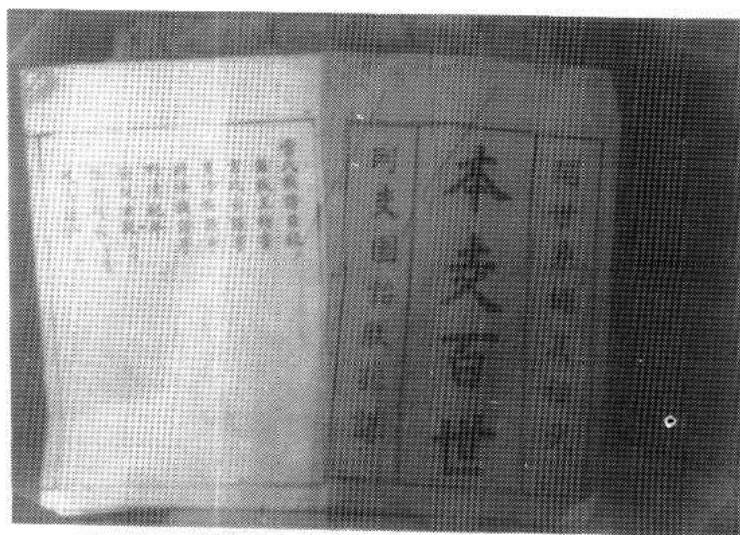


此系第八图，文曰：「刘皇后将龙狗献上，高辛帝号曰蓝匏。」

畚族三宝之二 族 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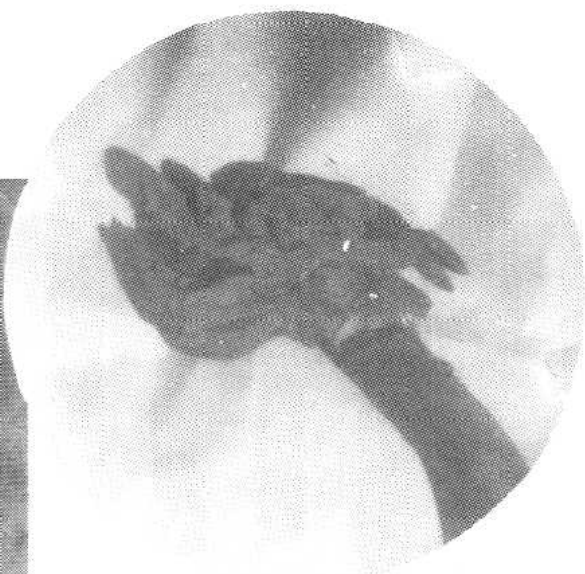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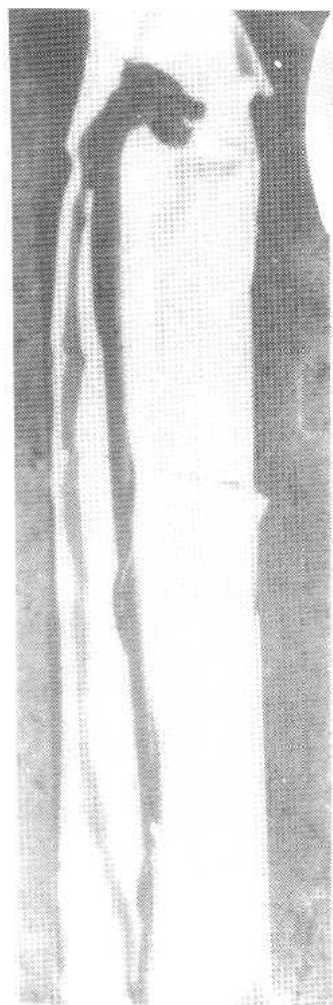


清嘉庆十六年修纂 （册大59×55厘米）



清同治癸酉年重修 （册大43×31厘米）

畚族三宝之三 龙头杖



龙杖用梗木刻制红色金花油漆，龙头宽13厘米，长22厘米，龙身长1.7米。系畚族祖先在霞兰里建村定居时带来遗物。

畚族三宝照片孔庆荣供稿

目 录

照 片

黄亦钊 孔庆荣

立身应世本真淳

——记六庵老人二三事 孔庆荣 (1)

忆“读书会”、“三益轩”、“学

联会” 孔庆荣 (10)

藤原大使是坐第十六次船还是坐第

十七次船 备前有隆 陈品全摘 (16)

参与县内外辛亥革命运动的霞籍人

士名录 张景骞 (22)

霞浦旧志编修情况 汤鸣统 (30)

霞浦第三中学史略 许一跃 (36)

霞浦烟草业小史 张景骞 (39)

前清、民国时期的霞浦佛教组织 徐 宏 (51)

畚家三宝 孔庆荣 (54)

霞浦松山靖海宫 张景骞 (59)

七佛城、玉山寺 黄亦钊 (65)

谈谈霞浦文物 孔庆荣 (69)

清咸丰六年兵部给劄董长洲·····	黄亦钊 (75)
略谈霞浦解放前的抗旱情况·····	陈德慧 (77)
八亿农民“棋王”——郑乃东·····	徐章铎 (79)
汤开醴先生事略·····	徐 宏 (82)
霞浦名菜·····	陈品全 (87)
霞浦蔬菜业展望·····	邓笑陀 (97)
霞浦民间常用谚语一百则	
····· 郑东夫 张景寿搜集选辑	(100)

立身应世本真淳

——记六庵老人二三事

孔庆洛

敬爱的六庵前辈（黄寿祺教授）逝世瞬已周年。大师云亡，道德文章永在。黄老一生从事育人之余，潜心研究易学，鉴于学术界研易方法颇多纷纭，且有舍本逐末，牵强附会之倾向，因提出“从源溯流”（即先精研《周易》本义，再从历代注解中考明源流派别）“强干弱枝”（即以象数、义理为骨干，旁及各种枝附学说）的研究方法，它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已为当代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同。近年他在助手帮助下完成的六十多万言《周易译注》，被誉为“五性”（引导性、通俗性、深刻性、考据性、综论性）具备的优秀著述，在同类书中鹤立鸡群。此书荣获1988—1990全国图书出版金钥匙奖。遗憾的是黄老未能亲见自己多年苦心谋划经营的《中国易学史》问世。作为世交晚辈，四十多年来我受到黄老的

教益实多，由于学识所限，于黄老专门著作尚未能置赞一辞，而对其一生真淳为人却感受颇多，现就所知略加记述，藉作黄老仙逝周年之献。

黄老尊师敬老是有名的，特别是对于老师总是态度恳挚，执礼惟恭。三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他从北平（北京）沦陷区间关归来省亲，并冒着骄阳前来看望我的祖父孔楚舟先生，一见老人即屈膝下拜请安，我适随侍在侧，他的举动在我的幼稚心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听说，他对当年他曾就学过的中小学教师都是这样。有次适为下雨天，他在街头遇见许献其老师，也便撩起长衫下跪，衣裤脏污了也在所不顾。有人以为这种做法未免太迂，但黄先生却显得十分自然。在那人情已渐趋淡薄的年代尤见出他的率真性情。他多年远在外地执教，但对早年师长坚持岁时问安，从不间断，到了晚年，他还积极地为一些师长搜集保存整理遗稿，或为之撰写传记。对老师的子女也极其关心爱护，生活困难的还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报答。

他笃于朋友之道，有些行事特别感人。杜悦鸣先生（福鼎乌杯人）是他的中学、大学同学，情意相投，友谊极深。据说他们当年同去北平求

学，路上杜突患霍乱病，来势很猛，黄老不顾传染危险，坚持自己看护，被病者呕吐的污物沾了一身也绝无怨言。大学毕业后，他们有一段时间不在一起，但鱼雁频通，诗作唱和不断。杜寄黄老诗有“六年形影共，万里梦魂通”之句。四十年代初杜倦游归来，黄老推荐他到福建师专学校任教。不久，杜因久患肺病不治在家乡逝世，黄老不但远道奔丧，为之处理后事，而且还促请校方编辑出版纪念册，并为其整理保藏遗稿。其后数十年间，他还频频关心和资助杜的遗属生活，认为理所当然，责无旁贷。他对于平时相交似乎十分亲昵，一旦有事便是“落陷阱而不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韩愈语）的那种人感到特别难过和厌恶。

黄老在高等学府任教近半世纪，桃李遍天下，校外青年（包括家乡子弟）慕名而为私淑弟子者也不少。他秉着“有教无类”之旨，均乐于指导和帮助，如介绍参考书，解答难题，批改习作，都有求必应，从不推辞。为了这些额外事务，他每每牺牲作息时间，甚至更深人静还在灯下工作。晚年他对家乡建设、特别是文教事业尤为关心，诸如编写地方志，兴办中小学，建设风

景点，以及诗社的建立，他都积极给予支持和指导，花费了不少心血。这些都已历历为人所知，不再赘言。

黄老是位恂恂学者，一生于政治名位淡薄处之，但他爱国，有强烈的正义感，思想认识一直跟随时代前进。有几件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也使我十分感动。1935年他回乡探亲，为徐登陞先生挽留担任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兼文史教员。时适县里修筑城关至盐田的公路，该校师生都参加了义务劳动。上作文课时，黄先生出了个《修公路记》的题目。学生陈子英（后参加地下党，1948年牺牲），听说县长张灿等一伙在征用土地雇用民工中克扣补偿费及工酬中饱私囊，感到气愤，就借作文提出批评。黄先生阅后大为赞赏，当即加上“指陈时弊，痛哭流涕，可谓年少贾谊，允为诸生冠冕”的评语，并把它张贴在校内橱窗内示范。张灿得知后老羞成怒，气冲冲地赶到学校，敲碎玻璃橱，撕碎作文纸，并枉加黄先生以“赤色异党分子”罪名，下令学校解聘，还企图进一步加害。黄先生先期得知，经许献其先生等师友掩护和资助，得以安全脱身并辗转重返北平任教。他十分愤慨，临走时送我

祖父一幅亲手书写的对联，用的是杜甫诗句：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我祖父和朱蓬斋先生均赠诗加以慰勉，朱先生有句：

“千金骏合市燕台”，用得是十分贴切的。

1947年，黄先生在福建师范学校任教授，霞籍地下党员叶挺荃在该校读书并进行革命活动。黄先生时有觉察，但他顺应时代潮流，不但未加阻止，反多方为之掩护。这年年底，县里一个反动头子来到省城，特约黄先生谈话，要他不要同共党嫌疑分子叶挺荃等人接近，言下颇带威胁。可黄先生却反问他：“我认为是好学生的，你们却认为是共产党，为什么好学生都会被共产党拉去？你们应该想想！”谈话当然不欢而散。黄先生回校后即告知叶挺荃等人，让其离校暂避，以免意外。叶挺荃赴游击队前夕特给黄先生一封推心置腹的信，委托代转给亲人的信和保藏书籍，黄先生冒着风险，一一照办。后来他提到挺荃同志的不幸牺牲，总是感到痛惜，甚至潸然下泪。他真诚地说：“挺荃虽是我的学生，但却是我学习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

黄先生这一种性格还表现在另外好几件事上。抗战前夕，他在大学毕业不久，激于爱国热

情，痛恨日寇侵略野心，曾奋然投笔从戎，在南苑接受军训后到佟麟阁将军（后殉国）部下工作，后因军队整编换防，他才重返教育岗位。1945年他因事回乡，应邀参加了地方上的一次集会，他针对当时官场的腐败风气，在即席发言中希望人们特别是青年人要有“獬豸触邪”的勇气，敢于向贪官污吏作斗争。把他这些言行贯串起来，一个爱国爱人民，是非爱憎分明，追求真理，倾向进步的老知识分子形象便巍然站在我们的面前了。从这也可见出，黄老在晚年终于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是十分自然的事。

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黄老也有这种际遇，但不论碰到何种情况，总是抱着豁达自适的态度。他青年时研究“易”学不久，与他的老师、易学大家尚秉和先生商讨其中的某些问题，即以其敏锐新颖的见解赢得了师长的称赞。日本学者誉其为学“精苦刻铭”。他并不以此自喜，而是更加兢兢业业地博览群书，从评鹭前人的得失中进一步提高自己。解放初期，“易”学未得有关方面的重视，他前些时的研究活动被认为是宣扬唯心主义，他本人则被看作是卜卦先生。连师院的胡院长也有这样看法。但他并不声辩，仍专心致志于

文史课的教学，学生有所疑问必予详尽的解答，直至他们满足为止；对事务性工作也多亲自动手，多方积极为新中国培养文科人才。后来胡院长了解他的为人为学态度以及教学成绩，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委之以重任，让他担任院务委员、文科主任，他不以前事为嫌，慨然接受新任务，更加努力工作。若干年后他们久别重逢，胡除赠诗两首外，还说：“以前未能从黄先生学《易》是个损失。”黄老和之以诗，中有“历变已教经验富，久违转觉感情深”；“问学商量诚可乐，互通声气望年年”等句，见出他们已从互相理解中增进了友谊。

文化大革命中，黄先生受到冲击，主要“罪名”是研究《易经》。有次我去他府上拜谒，偶然谈起文革中的遭遇，他告诉我说：“《易》学经历两千多年，绵延不绝，说明它是不好打倒也不能打倒的，重要的还是研究方向要正确、世事多变，一种学理也显晦有时，还是让时间来检验为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双百”方针重新得到贯彻，一些高等学府又把《易》学摆上研究日程。福师大也不例外。有人以为“一朝被蛇咬”的黄老也会“三年怕草绳。”其实不然，他

却欣然地负责起易学研究室工作，带起好几名研究生，又是写论文，又是选辑论文集，又是制订今后研究计划，忙得不亦乐乎。前年，他同他的助手张善文合写的《周易译注》出版，接着又着手编写《中国易学史》，这是列入国家科研的项目，并已初具规模，遗憾的是这一工程他已不能亲手完成也不能亲自看见它的出版了。上述几事可以窥见黄老“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拿得起也放得下的广阔胸怀。

1970年，他以花甲之年被下放周宁县茶广村。在校担任教学工作三十多年，突然一旦离开它，感情上是难受的。但他觉得能暂时跳出那种令人困扰的环境，却也是一种解脱。茶广是个极为僻远的小山村，离县城有数十里，而且无公路可通，生活条件比起省城有天壤之别，但他恬然处之，不以为苦，在村里，他既接受“再教育”，也从事对别人的宣传教育工作。“习耕晨出早，宣政夜眠迟”，十分认真负责。他在村既为群众新置的竹箩，布袋、木桶写标志、写春联、调解他们生活中的小纠纷，也参加他们的红白喜事、岁时庆祝，把自己置身于集体之中，因而得到村民的尊敬，也增添了自己的生活乐趣，